



文本革命：刘向、 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与 早期文本研究

A Textual Revolution: Liu Xiang,
Hanshu Yiwenzhi, and the Study of Early Texts

徐建委 著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

文本革命：刘向、 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与 早期文本研究

A Textual Revolution: Liu Xiang,
Hanshu Yiwenzhi, and the Study of Early Texts

徐建委 著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文本革命:刘向、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与早期文本研究/徐建委著.
—北京: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2017.9
ISBN 978-7-5203-0599-0

I. ①文… II. ①徐… III. ①《汉书艺文志》—研究
IV. ①G25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149052 号

出版人 赵剑英
责任编辑 熊 瑞
责任校对 赵雪姣
责任印制 李寡寡

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
邮 编 100720
网 址 <http://www.csspw.cn>
发 行 部 010-84083685
门 市 部 010-84029450
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

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
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
版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710×1000 1/16
印 张 23
插 页 2
字 数 412 千字
定 价 96.00 元

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,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
电话:010-84083683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

出版说明

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，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，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。它是经过严格评审，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。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，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，促进成果转化，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“统一设计、统一标识、统一版式、形成系列”的总体要求，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。

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

前 言

本书的研究以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为枢纽。《汉志》乃是刘向、刘歆父子所校“新书”之目录，而非西汉当世所传文献（或曰“旧书”）目录。《汉志》书目的实质，有两点尤为关键：其一，它记录了西汉末年有哪些文献的文本形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，而非西汉末年曾有哪些书流传。其二，《汉志》更近于一部“类目”，而非“书目”，即它虽然不是当时所有文献的记录，但却可以反映当时世传文献的主体类型。这两个方面，前人多未加留意或重视不足，故对《汉志》有颇多误读之处。反观学术史、文学史、思想史诸领域，我们会发现迄今为止，周秦汉相关问题的研究多在《汉志》框架内展开，即便近几十年来大量出土文献的面世依然未改变《汉志》模式的主导地位。然而，致命的问题是，没有充分考虑上述两个方面，就将《汉志》的书目结构默认为周秦汉学术和文献的基础背景，虽是对《汉志》书目性质的轻微的误读，却使得我们对周秦汉文献的认识，以及对其的处理方式发生了比较严重的偏差，即便仅仅是学理性的偏差，对于整体的研究而言，也足以具有根本的破坏性了。因此，重视并明晰《汉志》的性质，并有效利用之，会在周秦汉学术、文学研究领域，催生一种新的问题方式，本书的研究就是循着这种思路展开的。

内容上，本书分上、下两编。上编为综论，乃是在下编专题研究的基础上所作，因此是本书最后成文的部分。这部分讨论了以下两个主要问题：其一，西汉末年的文本革命（这是笔者大胆的，甚至有些粗鲁的命名）具体如何发生，又如何影响文本的内部和外部，以及我们如何相对准确地认识和利用西汉以前的文本；其二，我们如何恰当地遵循文本内部不同层次的“适用限度”，在《汉志》的基础上，超越先前主导周秦汉学术研究的“《汉志》主义”（命名还是有些粗鲁），更新研究方式，发现文本中那些原本被遮蔽的问题。特别需要说明的是，因综论乃在下编专题

2 文本革命

研究基础上成文，故有个别地方因论述需要，略有重复，作者学力稚拙，目前也只能如此处理了。

下编乃是专题的研究，分别涉及《毛诗》、《左传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汉书·五行志》、《汉书·艺文志·六艺略》等文献，其研究思路及基本内容，因每章均有导言，故于此不再赘述。

目 录

前言	(1)
----------	-------

上编 综论

周秦汉学术研究中的《汉志》主义及其超越	(3)
引言 简本《论语》与马王堆帛书《黄帝书》之疑问	(3)
一 刘向校书与《汉志》新目	(6)
二 文本革命:从开放性到闭合性	(10)
三 诸子传记文献中章的独立性	(17)
四 公共素材	(25)
五 “公共素材”流传样态的改变及其意义	(29)
六 新定本文献的互摄与“书亡而文未亡”	(32)
七 战国秦汉文本的综合性	(41)
八 古老文献的早期分立	(48)
九 文本中的学术史:战国秦汉间《春秋传》问题(一)	(52)
十 文本中的学术史:战国秦汉间《春秋传》问题(二)	(63)
十一 图像化与封闭性:《汉志》先天结构的形成	(71)
十二 碎片重组:《汉志》的先天结构与学术幻景	(73)
十三 学术史研究中的《汉志》主义及其超越(一)	(76)
十四 学术史研究中的《汉志》主义及其超越(二)	(81)
十五 学术史研究中的《汉志》主义及其超越(三)	(83)

下编 考辨

第一章 石渠议经与《汉书·艺文志》五经文本入藏中秘考	
——兼及《汉志》“六艺略”之特点	(91)
一 《汉志》五经今文本与宣帝时期的学官本	(92)

2 文本革命

二 由刘向校书推及石渠诸经的人藏	(96)
三 刘向校书之原委	(100)
四 中秘书来源蠡测	(102)
五 刘向校书与复核石渠之议	(105)
六 《汉志·六艺略》文献入藏时间拟测	(108)
第二章 《诗》的编次与《毛诗》的形成	(115)
一 引言:问题的提出	(116)
二 《毛传》与《尔雅·释训》之关系	(117)
三 三家、《毛诗序》中的《小雅》诗次问题	(124)
四 《春秋》学的自我建构:《诗》与《春秋》意义关联的形成	(129)
五 《春秋》视域:季札论《诗》与大、小《雅》的对调	(133)
六 《雅》在《风》前:《毛传》埋藏之《诗》古本编次	(138)
七 从礼乐编次到《春秋》编次	(142)
八 结论	(145)
第三章 《风诗序》与《左传》早期史料来源关系考	(146)
一 引论	(147)
二 《风诗序》与《左传》史事的相关或联系	(153)
三 《左传》人物引《诗》赋《诗》与《诗序》的关联	(166)
四 《国语》的旁证	(174)
五 结论	(179)
第四章 《史记·十二诸侯年表》与古本《左传》考论	(181)
一 小引	(183)
二 《十二诸侯年表》据《左氏春秋》所制辩	(187)
三 《十二诸侯年表》所见古本《左传》之异文	(197)
四 《史记·十二诸侯年表》史源略议	(202)
五 张、贾本《左氏春秋》之史料特点之一:史料编年与历法	(205)
六 张、贾本《左氏春秋》之史料特点之二:材料分割	(214)
七 张、贾本《左氏春秋》之史料特点之三:纪年方式	(217)
八 张、贾本《左氏春秋》之史料特点之四:南方诸侯记事优于	

今本	(222)
九 从《左氏春秋》到《左传》	(233)
十 《史记·十二诸侯年表》编纂过程拟测	(237)
十一 附论《春秋》三次日食错简与《春秋》编纂	(240)
十二 结论	(246)
第五章 战国秦汉间《论语》的流变与文献考古问题	(247)
一 引子:定州本《论语》引出的问题	(247)
二 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与今本《论语》的异同	(249)
三 《论语》古本的源流	(253)
四 从类型文献到单种古书——刘向校书与古文献的流变	(260)
五 《论语》古本问题的解决与文献考古问题	(267)
六 古文献关系网络中的《论语》及其成书的年代	(270)
七 附录:《说苑·修文》篇《齐论语》佚文蠡测	(273)
第六章 孟子的圣人系谱及其知识背景	
——兼窥战国秦汉间儒家知识系统的流变	(283)
一 尧、舜故事与《尧典》的流变	(285)
二 文王故事与文王《尚书》	(300)
三 《孟子》与战国儒家《诗》学传统	(311)
第七章 刘歆援数术入六艺与其新天人关系的创建	
——以《汉书·五行志》所载汉儒灾异说为中心	(321)
一 《汉书·五行志》所录《洪范五行传》文本结构的调整	(322)
二 刘歆引数术入六艺及其学术渊源	(329)
三 《洪范五行传》与讖纬的兴起与流行	(335)
四 从重人事到重天道——刘歆新天人关系的创建	(340)
五 结论	(344)
参考文献	(346)
后记	(358)

上 编

综 论

周秦汉学术研究中的《汉志》主义及其超越

引言 简本《论语》与马王堆帛书《黄帝书》之疑问

1973年，河北省定县发现了一座汉代古墓，墓主为西汉中山怀王刘修。刘修死于汉宣帝五凤三年，即公元前55年，故墓中器物的下葬时间可大体确定，当在公元前55年至公元前54年间。此墓最重要的发现之一，乃是一批被早期盗墓者火焚致残的竹简。整理者从中清理出《论语》、《文子》、《太公》等古书。其中《论语》简有620多枚，多为残简，简长16.2cm，宽0.7cm，满简20字上下，存7576字，不足今本二分之一，这就是著名的定州竹简本《论语》。定州本的分章、字数均与今本《论语》不同。如定州本《尧曰》篇末有一枚题记简记有以下文字：“凡二章，凡三百廿二字。”而今本为三章343字，竹简本较今本少一章，但字数相若。总体来看，定州本章数多于今本，各章字数一般也多于今本。某些简本的章，今本则分作数章。因此其文本长度似要大于今本。^① 整理小组详细比勘了竹简本与传世本的异同，认为竹简本包含了汉代《鲁论语》本来的一些东西，并暗示此本《论语》与萧望之奏议放在一起^②，应该就是当时的《鲁论语》。

但是，从文字上，的确难以判断定州本是哪种《论语》，原因是简本《论语》有的异文与古文《论语》相同，如《为政》篇“毋違”，简本作“無違”，郑玄注曰“古文‘毋’為‘無’”；《八佾》篇“郁郁乎文哉”，简本作“彧彧乎文哉”，《说文》段玉裁注曰“今本《论语》‘郁郁乎文哉’，古多作‘彧彧’”。有的文字与《鲁论语》相同，如《阳货》篇

①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汉墓竹简整理小组：《定州汉墓竹简论语》，文物出版社1997年版。

② 与《论语》一同出土的还有萧望之奏议，据《汉书·艺文志》记载，萧望之传授的是《鲁论语》，汉宣帝五凤三年前后，望之时任太子太傅。

4 文本革命

“恶果敢而窒者”，《释文》曰“鲁读‘窒’为‘室’”，是《鲁论》作“室”，今本亦然；有的异文则与《鲁论语》不同，如《公冶长》“可使治其赋也”，《释文》曰“梁武云：《鲁论》作‘傅’”；还有的文字明显与《鲁论语》不同，却与《鲁论语》传授中的音读相同，如《述而》“易可以毋大过矣”，“易”简本作“亦”，郑玄注曰“鲁读‘易’为‘亦’”；“正唯弟子弗能学也”，“正”简本作“诚”，郑玄注曰：“鲁读‘正’为‘诚’”；《卫灵公》“好行小慧”，“慧”简本作“惠”，《释文》曰“鲁读‘慧’为‘惠’”等。^①

竹简本的分章与今本差异颇大，如今本分作四十章以上的有《宪问》四十四章，《卫灵公》四十二章，但竹简本记录的四十章以上的章数则是四十七章和四十四章，未知属于哪两篇。据《汉书·艺文志》和《张禹传》，西汉时代《论语》主要有《齐论语》、《鲁论语》和《古论语》三种，今本《论语》乃是西汉张禹整理的《鲁论语》，后经何晏等人集解而传于世。皇侃《论语集解义疏序》曰：“今日所讲，即是《鲁论》，为张侯所学，何晏所集者也。”^②竹简本虽然文字、分章接近于今本，但因其异文，却难以与《鲁论语》画上等号。

《尧曰》篇今本有三章，竹简本《尧曰》篇虽附录了今本的第三章，但其“章数简”却记载此篇“凡二章，凡三百廿二字”，与今本不同。康有为《论语注》认为今本第三章乃是《齐论语》所有，《鲁论语》实为两章。^③又，《齐论语》多《问王》、《知道》二篇，竹简本无。且据何晏《论语集解序》记载，“《齐论语》二十二篇，其二十篇中，章句颇多于《鲁论》”^④，但竹简本与今本在章句上还是比较接近，故竹简本也非《齐论语》。

何晏《论语集解序》称《古论语》“分《尧曰》下章‘子张问’以为一篇，有两《子张》，凡二十一篇，篇次不与齐、鲁《论》同”^⑤，竹简本《尧曰》下章“子张问”附录于篇后，因此，虽然竹简本有多处文字与《古论语》同，但它也不是《古论语》。

① 详参《定州汉墓竹简论语》。

② 皇侃：《论语义疏》，中华书局2013年版，第5页。

③ 康有为：《论语注》，中华书局2012年版，第298页。

④（清）阮元校刻：《十三经注疏》，中华书局影印本1980年版，第2454页。

⑤ 同上书，第2455页。

那么，这个版本《论语》的《汉书·艺文志》失于记载？它是《齐论》、《鲁论》、《古论》之外的又一种《论语》，为刘向所不见？安徽省阜阳汉墓出土之《诗经》简，亦有类似疑问。上述两个问题的提出，实在是出于对《汉书·艺文志》的误读。何以言此？容后再明，此其一。

其二，马王堆汉墓帛书出土后，《老子》乙本卷前古佚书《经法》、《十大经》、《称》、《道原》四种，因内容涉及黄老学中的黄帝，而受到广泛的关注，其命名更是颇有争议。1975年第1期《历史研究》上刊载了高亨、董治安两先生的论文《〈十大经〉初论》，文中提到“《汉书·艺文志》‘道家’一类，记有‘《黄帝君臣》十篇’，《十大经》可能就是这部书”。同年第1期的《考古学报》发表了唐兰先生的《马王堆出土〈老子〉乙本卷前古佚书的研究——兼论其与汉初儒法斗争的关系》一文^①，该文从内容、抄写时代和历史背景、传授源流和流传情况三个方面力图证明帛书《老子》乙本前的古佚书就是《汉书·艺文志》里的《黄帝四经》。唐文影响尤大，几被视为定论。之后的许多学术论文和著作都径直将马王堆《老子》乙本卷前古佚书称为《黄帝四经》，并以此作为研究汉初乃至战国末年黄老之学的主要典籍之一。其后，1993年出版的《道家文化研究》第三辑上刊出了裘锡圭先生的《马王堆帛书〈老子〉乙本卷前古佚书并非〈黄帝四经〉》一文，亦从学术特点等方面力辩此书非《黄帝四经》。裘先生其文雄深，发表以来，多为学者采信。但是，问题并未到此为止。

辨析《经法》、《十大经》、《称》、《道原》四篇是否为《黄帝四经》，或者《十大经》是否为《黄帝君臣》，其默认前提乃是：《汉书·艺文志》如同《隋书·经籍志》、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，所载书目、卷帙乃两汉时代书籍存世、流传情况之记录，据之可见汉代典籍之大概。此乃学术常识，粗言之，当然正确。但若以此为前提来判断新出土文献与《汉志》书目之关系，则有极易忽视之“学术错位”。同理，以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校勘为基础，讨论出土文献与《汉志》书目之关系，也误读了《汉志》的学术特点，出现判断上的“错位”。

何种“错位”？《汉志》乃新书目录，而《隋志》、《四库提要》则主要是旧书（旧有之书）目录也。所谓新书者，乃指刘向校讎重定之书。定州竹简本《论语》是刘向校书之前的《论语》形态，与《鲁论》、《齐

^① 上述两文收入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《经法》，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。

6 文本革命

论》、《古论》等新校书当然会有异同。从基本形制上说，定州简《论语》的确属于《鲁论语》这一大类中的一种。^①而《汉书·艺文志》所录《黄帝四经》亦为刘向新定之书。将新出战国秦汉简帛文献比附《汉志》群书，这是以“后名”命“前书”，故不可取。刘向校书与《汉志》之关系，为目录学常识，然其中的细节与意义，容易被忽略，所以还有陈述之必要。

一 刘向校书与《汉志》新目

汉成帝河平三年（前26）至汉哀帝建平元年（前6）之间的二十年，除了王氏家族逐渐掌控政局外，并无大事，放到前汉的历史中，远没有其他时段引人注目。但这二十年对于中国学术史来说，却意义非凡。其影响于中国学术，或只有孔子创论六艺之学可伯仲之。河平三年秋八月，雅好图书的成帝命光禄大夫刘向整理其秘府庋藏，兼派谒者陈农广收天下遗书，以供刘向校勘之用。此次校书的主要参与者还有步兵校尉任宏、太史令尹咸、侍医李柱国，他们分别负责校勘兵书、数术和方技三部分文献。另外，刘伋^②、刘歆、杜参、房凤、苏竟、卜圭、富参、班序、史丹、王龚、望、立^③等人亦参与其中。这次的文献整理直到刘向辞世尚未完成。绥和二年（前7）三月汉成帝崩，四月汉哀帝即位，复命刘歆卒其父业，“歆乃集六艺群书，种别为《七略》”。至此，这次大规模的校书事业才算功成，历时近二十年。因刘向约卒于绥和元年（前8）前后，而《七略》成书于绥和二年至建平元年之间^④，故这次校书已在刘向主持下接近完成。

刘向校书，每校一部，均会集众本，勘正讹误，重新缮写新校之书于简帛^⑤，并作《叙录》一篇，上奏汉成帝，汇报此书的整理情况，介绍作

① 参下编第五章“战国秦汉间《论语》的流变与文献考古问题”。

② 据释道宣《广弘明集》卷三所录阮孝绪《七录序》曰：“至孝成之世，命光禄大夫刘向及子俊、歆等讎校典籍。”姚振宗《隋书经籍志考证》引孙星衍《续古文苑校文》曰：“案俊当作伋，向本传云长子伋以《易》教授，官至郡守，不云曾受诏校书。阮此言疑出《别录》、《七略》也。”（《二十五史补编》第四册，中华书局影印本1998年版，第5424页。）

③ 二人失其姓氏。

④ 参见钱穆《刘向、歆父子年谱》，《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》，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。

⑤ 《风俗通义》：“刘向为孝成皇帝校书籍，二十余年，皆先书竹，为易刊定，可缮写者，以上素也。”（王利器：《风俗通义校注》，中华书局2010年版，第494页。）

者及书之内容。南朝梁阮孝绪《七录序》云：“昔刘向校书，辄为一录。论其指归，辨其讹谬，随竟奏上，皆载在本书。”验之宋刊《荀子》、《说苑》等古本，《叙录》正是附于新书目录之后，首卷之前。阮氏又云：“时又别集众录，谓之《别录》，即今之《别录》是也。”^①故《别录》为刘向校书《叙录》之总汇。此书至唐尚有流传，宋以后亡佚，迄今相对完整的《叙录》仅存数篇而已，如《战国策叙录》、《荀子叙录》、《说苑叙录》等。

刘歆的《七略》就是在他父亲的《别录》的基础上成书的，班固《汉书·艺文志》曰：

每一书已，向辄条其篇目，撮其指意，录而奏之。会向卒，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。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《七略》，故有《辑略》，有《六艺略》，有《诸子略》，有《诗赋略》，有《兵书略》，有《术数略》，有《方技略》。今删其要，以备篇籍。^②

所谓“总群书而奏《七略》”者，阮孝绪《七录序》称刘歆撮《别录》之指要而著之。《别录》、《七略》今俱亡佚，各数十百条遗文无足排比考辨，然阮氏得见二书，故其言当可信据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亦用阮氏之说乃又一证。回观《汉书》，汉哀帝命刘歆卒其父业，刘歆受命未久而书成，则《七略》乃《别录》之略可知。由此判断，《汉志》所云刘歆所总之“群书”，必非未校之书，而是乃父主持校订之新书也。

班固删裁《七略》而成《艺文志》，近乎完整保留《七略》脉络骨骼，仅增三家五十篇，省兵十家而已，连“六艺略”、“诸子略”之名，亦沿袭不改。则班《志》实刘向新校群书之目录也^③，验之《别录》佚文更无疑矣。颜师古注即多引刘向《别录》注《艺文志》，如注《易》之《服氏》传曰：“刘向《别录》云：服氏，齐人，号服光。”注《易》之《神输》曰：“刘向《别录》云‘神输者，王道失则灾害生，得则四

① 参见张舜徽《文献学辑要》，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，第26页。

② (汉)班固：《汉书》卷30《艺文志》，中华书局1962年版，第1701页。

③ 参见拙著《〈说苑〉研究——以战国秦汉之间的文献累积与学术史为中心》之“绪论”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。

海输之祥瑞’。”注《周书》曰：“刘向云：‘周时诰誓号令也，盖孔子所论百篇之余也。’今之存者四十五篇。”注“入刘向《稽疑》一篇”曰：“此凡言入者，谓《七略》之外班氏新入之也。其云出者与此同。”注《礼》之《王史氏》曰：“刘向《别录》云六国时人也。”注《雅琴龙氏》曰：“刘向《别录》云亦魏相所奏也，与赵定俱召见待诏，后拜为侍郎。”凡此种种，不胜枚举，故足见班《志》实据《别录》而来者也。

唯需特别留意处，是《汉书·艺文志》乃新书目录，非旧书目录。新书相较于旧书有何种改变，不仅仅是文献学问题，更关涉周秦汉学术研究之根本。

一般常识而言，周秦汉之间历史、学术、文学与思想研究的关键，乃是古书文本问题，因战国秦汉古书文本之“构成”、写定、流变至今尚存诸多疑问未解。文本有疑，则论断难下。进而言之，战国秦汉古书文本问题的关键，乃是刘向的校书。刘向校书何以如此重要，因其为群书写定新本也。新书相较旧书，自然有变化，或正文字，或补脱文，或重订篇章等，不一而足。汉成帝河平三年至汉哀帝建平元年之间的这二十年，西汉以前所有的传世古文献的文本形式，几乎或大或小地改变了。举三例：

其一，《尚书》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曰：“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、大小夏侯三家经文，《酒诰》脱简一，《召诰》脱简二。率简二十五字者，脱亦二十五字，简二十二字者，脱亦二十二字，文字异者七百有余，脱字数十。”^①考今本《酒诰》、《召诰》，无脱简之迹，故知刘向用中古文《尚书》补足今文《尚书》之脱简。今文《尚书》经刘向之校，而增补数字。

其二，《晏子》。刘向《别录》曰：“所校中书《晏子》十一篇，臣向谨与长社尉臣参校讎太史书五篇，臣向书一篇，参书十三篇，凡中外书三十篇，为八百三十八章。除复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，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。……晏子盖短，其书六篇，皆忠谏其君，文章可观，义理可法，皆合六经之义。又有复重，文辞颇异，不敢遗失，复列以为一篇，又有颇不合经术，似非晏子言，疑后世辩士所为者，故亦不敢失，复以为一篇。凡八篇，其六篇可常置旁御观，谨第录。”^②则今本八篇之《晏子》乃刘向据中外各类“晏子书”重编者也。其每一篇皆为新编，故有七、

① (汉)班固：《汉书》，中华书局1962年版，第1706页。

② 张舜徽：《文献学辑要》，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，第7页。